

# 论后解构主义时代 译者主体性之重构

□杨镇源 [四川大学 成都 610064]

**[摘要]** 由解构主义主导的译论忽视了实际的翻译发生过程,在将译者主体性推至极端的同时也导致了翻译本体论的沦落。本文立足实际的翻译活动,以主体间性为依托来建构译者的主体性,指出译者主体性实际上是不同翻译主体之间对话、碰撞而达致共识与融合的结果,是一种在框架约束下的自主发挥。这种认识克服了解构主义语言虚无论的局限,为后解构主义时期译学的本体构建作出了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主体间性; 解构主义; 重构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9)03-0070-04

自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潮有力地冲击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主导的翻译研究。面对解构主义译论的有力拆解,一向为翻译研究者坚信的“忠实”与“对等”原则变得不堪一击。然而,在丧失了翻译的稳定性之后,译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和迷失感。如果从研究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则可以对解构主义译论进行冷静的反思,并以此出发讨论翻译研究在进入后解构主义时期译者主体性的重构问题。

## 一、解构主义思潮下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

自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之后<sup>[1]</sup>,后现代主义便走上了一条张扬个体主体性的道路。而后现代思维延伸到解构主义那里更是使这种主体性膨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在其翻译观上,这种过度张扬则体现为对原文的彻底不信任,也直接导致了翻译本体的消亡。

由瓦尔特·本雅明肇始、经德里达发展成型的解构主义译论把翻译研究推向了语言虚无论的泥潭。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贬斥了为传统观点所称赞的“透明”翻译,提倡以《圣经》隔行译本为榜样进行直译,并通过这种方式回归全人类

和谐通融的“纯语言”。于是,原文依赖翻译而生存,译文成为原作的来世<sup>[2]</sup>。而对于德里达来说,任何译文都是所谓的原文在时间上有所推迟,在空间上有所差异的“延异(differance)”。由于原文终会“撒播(disseminate)”在现实的层层语言环节当中,因此原文与译本之间也就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在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解读中,德里达把原文归为带有原罪的负债者,对他来说,“有待翻译的原文从一开始就跌落、流亡。译者必须赎罪(erlosen)、免罪、解除、试图免除自己的债务,而那归根结底都是同一笔债务——而且是无底洞。”<sup>[3]</sup>这种救赎显然不能依靠“透明”的翻译来承担,因为那将无法为原文提供其赖以显身的他者,于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无损翻译(特别是神圣文本翻译)的要求只会沦为对“一种深渊”的追溯<sup>[4]</sup>。这一点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比喻中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说明,他认为文本就像一个洋葱头,有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面没有核心……唯有一层层剥下去<sup>[5]</sup>。这个比喻否定了文本的中心意义,即原文本是空无,必须要靠在现实理解中的层层撒播才能存活下去。而在德曼那里,对原文的不信任更是达到了极限,甚至连本雅明推崇备至的纯语言都成为解构的对象:

[收稿日期] 2008-11-19

[基金项目] 本文由2009年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翻译的文化功率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杨镇源(1980-)男,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原文的这次运动是一次漫游,一次逸轨,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一次永久的流放,但不是什么真正的流放,因为根本没有祖国,没有你被流放出来的故土。也根本没有reine Sprache,没有纯语言,它根本不存在,除非作为寓于所有语言中的一种永久断裂,尤其是包括人们称做自己的那种语言断裂<sup>[6]</sup>。

在解构主义的冲击下,原文的权威性从根本上遭到了消解,这使得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了正当的理由,也让译者从对原文唯唯诺诺的奴仆成为原文赖以生存的依靠。然而,译者主体性却由此不自觉地滑向了无限制张扬。当这种主体性膨胀到极致时,其发现自身无力承担起现实翻译中理性与秩序的构建,只得任由文本意义滑入语言虚无论的泥潭,这也使得译者丧失了最基本的安全感,从而不知何去何从。显然,解构主义并不能成为我们在新时期译学建设的真正诉求,要克服解构主义带来的迷惘感,则需要重新考虑译者主体性的构建。

## 二、立足于实践的译者主体性重构

解构主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以阐释哲学为基础,拆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的天真假设。这种假设的前提即“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sup>[7]</sup>于是,译者的主体性在工具理性的压制下显得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即无论译者怎样努力试图在翻译中让自己隐身,所谓完美的“忠实”或“对等”依然是那样遥不可及,也难怪I·A·理查兹(I. A. Richards)会感叹翻译是“宇宙进化史上产生的最为复杂的事件”<sup>[8]</sup>。解构主义消解了这种天真的假设,使译者认识到原文并不是如以往那样高高在上,而仅仅只是无限意义撒播上的一个环节而已,因而原文与译文并无本质区别。既然如此,传统意义上的“忠实”不再构成翻译的最高标准,译者也无需充当原文的复制者,而是有充分理由在翻译中彰显自己的个性。这无疑是对译者主体性的极大解放。

然而,解构主义与此同时却未指明译者应该如何约束自己的主体性,这实际上无可避免地纵容了译者主体性的过度膨胀。在这种语境下,文本意义最终走向了彻底消亡,沦为巴特所说的空心洋葱头结构。就像玛丽·斯内尔霍恩必(Mary Snell-

Hornby)评价的那样:“现在看来,‘死亡’(作者的)并不见得就是文本复活的预备,更多时候它意味着文本的消亡。”<sup>[9]</sup>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度放纵,以致文本意义的完全消解构成了解构主义无法克服的一个硬伤。而要超越解构主义的这一局限性,我们就不得不反思译者的主体性问题。

### (一) 立足实践:视点的转换

解构主义之所以会对译者主体性采取完全放逐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狂热消解原文权威的同时缺乏对翻译实践的全面考量。毕竟实际的翻译活动并非是一种完全陷入迷醉的酒神式狂欢。解构主义只关注到译者个性张扬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译者在实际翻译中的理性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形成的制约,从而显得片面和偏激。诚然,译者确实需要走出对原文亦步亦趋的状态,但如果任由译者主体性无限发挥,那么难免会引起翻译在本体论上的滑落。正如葛校琴的评价:“后现代视野中的这种翻译概念把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彻底进行了颠覆,翻译被视为个体相对主义的解读,有时甚至雷同于文学批评,完全游离了翻译本体论的视域。”<sup>[10]</sup>如果任由文本意义在延异和撒播中不加限制地越走越远,那么翻译研究便会越来越脱离实际的语言运用,成为无根之水,译学建设也无法找到本体的依托。

因此,要克服解构主义的偏激和非理性,重构译者的主体性,我们就需要立足实践,即把目光转回到具体的、活生生的实际翻译活动。这就要求我们放弃虚无主义式的无限追问(例如探究延异与撒播的终极问题),转而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维特根斯坦就曾经把所谓的“理想语言”比作让人无法行走的冰面,并提倡回到充满摩擦的地面(即现实使用中的语言)中来<sup>[11]</sup>。马克思在提出实践诠释学时也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sup>[12]</sup>这种态度扭转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即“无论是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sup>[13]</sup>解构主义译论虽然最初从翻译实践中看到了理解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延宕性,并由此着手解构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但接下来它却背离了实践,对译者的主体性采取了完全放逐的态度,走上了片面和偏激的道路。如果我们重新将目光投入实际的翻译过程,便会发现在极度膨胀的译者主体性下被遮蔽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译者主体在翻译主体间性的张力中才得以生存。因此,要突破解构主义的局限,实现后解构主义时期译者主体性的重构,我们就必须着眼

于实践,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探究翻译的主体间性。

## (二) 依托于主体间性的译者主体性重构

对此,如果我们考察实际的翻译过程,便会发现译者并不是像解构主义说的那样拥有无限的自由,因为总会有一些显性或隐形的规则制约着译者的选择,使其不能肆意妄为。对此,吕俊教授倒是有一段从接受美学出发的精辟言论:

原文文本是一个开放系统,不再是封闭的系统;所以它可以有不尽相同的译本,对一些问题可以有不同的阐释,这是它有空白、空缺和不定点的原因。但接受美学的理论也同时指出它是一个框架结构,有一定的定向功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会是贾宝玉,也不是阿Q,也不会成了任何别的人物。他的身份、地位、为父报仇等这些事实是不可以改动的。至于他为父报仇为何延宕不已,迟缓不决的原因可能各人有各人的解释,这一点是开放的;因为莎士比亚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个空缺和空白,是个不定因素。就是说,翻译者可以在那些空缺与空白之处发挥他的想像,并用他的先有、先在、先识的知识去解释去填充,在不定点之处去用你的思想去确定,并不是去改变原作的图示框架<sup>[7]</sup>。

这种从翻译实践出发的考量也让我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译者享有自由发挥的权力,但其主体性依然无法脱离一定“图式框架”的限制,这种自由与规约的双重作用使译者的主体性处于一种张力之中。显然,宣扬译者主体性至上的解构主义者看不到这种制衡,而当我们从解构主义的这种狂躁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便会发现译者的主体性原来早就融入了由主体间性交织成的网络中。译者本人的前见、读者的期待、赞助商的意愿……而译者本人就位于这诸多因素的中央,在各种影响力的牵制下,译者也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因此,译文是译者在诸多因素形成的张力之中进行协调的产物,正如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所说,“从社会文化的维度来看,翻译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屈从于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制约力的主体行为。”<sup>[13]</sup>译者、读者、赞助人等等主体在翻译中各自发挥着其主体性,同时相互碰撞、磨合,并在此过程中达成一致,生产出最终的译文。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某个翻译主体的主体性,那么便会忽视翻译的实际发生过程。解构主义译论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过度张扬的译者主体性遮蔽了翻译发生过程中主体间性对译者主体性的制

约。

由此可见,译者生产译文的过程就是各种主体间性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本人的前见和其他主体产生的影响不断地碰击,又不断地交融,这实际上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批判了历史主义对前见的排斥,充分肯定了前见的积极作用,因为“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sup>[14]</sup>这种融合造就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即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这也是伽达默尔讨论精神科学真理问题的依据。因此,作为理解者的译者不可能脱离他在具体翻译中的效果历史。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把主体间性归结到交往理性的建构,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以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sup>[1]</sup>。与伽达默尔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在不反对理解建构的开放性的前提下更强调由交往范式确定的规约性,并把真理归结到人们在对话、碰撞中协调、建构的共识,这便是他倡导的“共识性真理观”。他号召以非强制的方式来促成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并以此形成共识性真理,同时这种共识性真理对主体行为又产生框架性的约束,使其不能无限发挥。而阿尔都塞(Luise Althusser)则对这一过程有着更明确的划分,他将意识形态形成的一般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社会对个人主体进行召唤;2)个人听从社会的召唤并向社会屈从;3)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互相识别,主体之间相互识别以及主体的自我识别;4)主体在识别的过程中产生自我认识,进而把这种认识投入实践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sup>[15]</sup>。阿尔都塞看到了subject一词在意味着“主体”的同时又具有“屈服”的意思,并籍此指出主体其实早就受到一系列世界的代表体系的制约。在上述视点的参照下,译者作为翻译中一切矛盾的焦点便不可能脱离主体间性的影响,因而也无法像解构主义所说的那样无限制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

对翻译的主体间性的关注纠正了解构主义对译者主体性的过激推崇,也使翻译研究回归到其本体论的范畴。解构主义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度推崇使翻译陷入了迷惘,因为译者发现自己在随意凌驾原文的同时失去了所有的安全感和依赖感,翻译成为没有规则、供人任意发挥之地,这反而使译者主体性走向了本体论上的消亡。在主体间性视角的参照下,我们则看到译者的主体性实际上是翻译主体之间相互碰撞、交流后最终协调、融合的结果,这一形成过程依赖于主体间对话的开展和共识的形成。译者

的主体性并非单纯的个人产物,而是不同主体因素之间进行整合的结晶,它不再像解构主义宣称的那样肆无忌惮,而是在不跨越主体间共识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自主发挥,因此译者主体性实际上是依托于主体间性才得以存在。这种冷静的反思克服了解构主义的局限性,也为翻译研究在进入后解构主义时期的建构铺下了砖石。当然,翻译的主体间性框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历史性和流变性,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此不予讨论。

### 三、结语

在解构主义大潮的冲击下,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也走向了过度的膨胀。在这样的思维下,文本的意义被推向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沼泽,翻译也遭到本体论的沦落。因此,译学呼唤对解构主义的超越。当我们立足于实际的翻译,依托于主体间性去重新构建译者的主体性时,便会发现译者主体性的形成实际上是不同主体的主体性互相交汇、冲突而最终达成一致共识的过程,译者既享有一定自由,又不能越出这个共识的框架。这一论证有助于实现翻译在本体论上的回归,也为译学在后解构主义时期的发展作出了探索。

### 参考文献

- [1] NIDA E A.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84(2): 26.
- [2] Snell-Horny, Ma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2006.

- [3] GIDEON T.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 保罗·德曼. "结论": 瓦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 [A]. 陈永国, 主编. 翻译与后现代性[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5] 德里达. 巴别塔[A]. 陈永国, 主编. 翻译与后现代性[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 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下)[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7] 葛校琴. 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8]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9]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0] 伽达默尔. 诠释学 I: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M]. 洪汉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1] 刘宓庆.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12] 吕俊.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14] 瓦尔特·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A]. 陈永国, 主编. 翻译与后现代性[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5] 徐贵. 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A Post-Deconstructionist View: 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YANG Zhen-yu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Negligent of actual translating activities, deconstructionist translation theories de-ontologizes translation by over-elating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scope of intersubjectivity, which is actually achieved as a consensus through dialects and conflicts. Therefore, translation is a free play reined by a certain framework, making the epistemology overcome the nihilistic lingual view of deconstructionism.

**Key word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deconstructionism; reconstruction

编辑 范华丽